

陳浩天自稱「革命黨」說明什麼？

有話要說
方靖之

可以知道「香港民族黨」自稱「革命黨」，即是說他們的目標是不排除採取非法暴力手段來推翻特區政府，並且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。先不論其目標如何荒誕，但對於其本質卻必須高度警惕，並且採取強力措施遏止。

雖然香港至今仍未就基本法第23條完成立法，但是根據現在的普通法及本地的成文法，香港都一直有保障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的本地法例。同時，有關法例亦由回歸前保障「女皇陛下」變成保障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」，這說明香港法例對於煽動分裂的行為，並不存在所謂「法律真空」。例如，香港法例第200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2條，任何人（a）向中央政府發動戰爭或與他人串謀向中央政府發動戰爭，意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央人民政府；或旨在以武力或強制手段強迫中央政府改變其措施、意見，或向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的立法會施加武力或強制力，或向其作出恐嚇或威嚇；（b）或鼓動外國人以武力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區；（c）或以任何方式協助與中央政府交戰的公敵，即屬干犯叛逆罪。就是最明顯的一條。

固然，香港過去並未有引用法例對付分裂行為，但此一時彼一時，面對「港獨」勢力愈益猖獗，當局必須研究採取哪些法例遏止分裂行為，並且通過檢控造成案例，震懾「港獨」分子。

資深傳媒人

「香港民族黨」召集人陳浩天，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，「看不到『一國兩制』對香港有保障，這只是過渡性安排，現時應討論香港前途，要『獨立』還是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城市」。他還說，「香港民族黨」成員全部已預料到有後果。被問到為何黨員身份不公開，他說該黨接近一個「革命黨」，不需要公開成員身份，最重要是達成目標。

陳浩天的說法說明了一個事實，就是這個所謂「香港革命黨」並非是一個單純的政治組織，而是以推動「港獨」為宗旨的「革命黨」。即是說，他們是有組織地策劃「港獨」，這樣其性質就不再是言論自由，而是具體的「分裂」行動。對於這樣一個違法組織，不但絕不能讓其註冊、開戶，更應研究採取法律行動制裁。否則，「港獨黨」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在香港運作，危及香港安危。

陳浩天說得很清楚，「香港民族黨」是一個「革命黨」，所以其成員絕不能公開他們的身份。所謂「革命黨」，在中國的近代史上，指的是清朝末年一批如興中會、共進會、文學社、華興會、光復會、同盟會等以發動革命政變推翻清朝為目標的組織。由於他們採取的多是暗殺、襲擊、破壞等手段，所以成員身份需要高度保密，否則後果極為嚴重。

對於這些「革命黨」歷史自然有其評價，但其性質都是一樣，就是採取非法、暴力甚至是恐怖的手段，去達到推翻政權的目的。在釐清其性質之後，就

美國在香港的大小動作



港事港心
樂肇南

漏百萬密件，都可能是美國中情局「整」政治對手的行動之一。

「港獨」此舉，口稱是誠心為了香港，其實還是「小人行險以倖幸」的亂港行為，只會令香港淪亡。所以必須制服、關押「港獨」，可以如同美國在古巴建「關塔那摩拘

禁營」拘留伊期蘭極端分子一樣，設管拘押。甚至不妨與萬多名南亞非法入境者，同時同營但分區暫扣，依法消除香港不穩定因素。

特事特辦，治亂世用重典。「港獨」不會自動消失，不能再如處理2014年「佔中」的「無為而治」79天。或如處理今年元旦旺角暴亂事件那樣，慢吞吞「姐手姐腳」地緝拿和起訴千犯者。應該如美國佬處理極端分子一樣，關押至到期審判時為止。香港是時候摒棄只能拘留48小時的限制了。美國佬難道還有膽量武力干預香港？

前民航處處長

陳光南兄在4月7日大作《鏗鏘集「港獨」片和電影「十年」為何齊現身》中，闡析了「港獨」毫不避嫌的長遠計劃，就是「佔中」發起人戴耀廷所宣導的「拆散中國為碎片，然後重新組合成為一個與其他區域有別的主權體」。

「港獨」快速發展，已進展至戴耀廷的論調與李登輝、石原慎太郎的「支那七塊論」看齊，兩者可以說是殊途同歸。石原「支那七塊論」是妄想以分裂中國開始，然後看情況將這七塊碎片整合為一個現代滿洲國傀儡，或是乾脆征服、併吞。

老中青「港獨」乘着日美在釣魚島、南海諸島問題上來勢洶洶之勢，大舉出動要為台灣上台在即的台灣民進黨，和香港得了寸正在進尺的「港獨」打氣。「兩獨」互相鼓勵，企圖令崛起的中國被內部力量搞垮。

甚至近日某律師行被黑客入侵，泄

「撐粵語」行動令粵語庸俗化



議事論事
梁日昌

香港一些人最近的「撐粵語」行動愈演越烈，指粵語受普通話威脅而須加以「救亡」。這無疑是與「港獨」唱雙簧。粵語在香港所受威脅並非來自普通話，而是來自對粵語存在與使用狀況完全無知、盲目的地方分離主義觀念。這種分離主義觀念非但危及本地粵語，且對香港下一代的語文能力貽害無窮。

對下一代語文能力的貽害

所謂「撐粵語」，最大的理據是：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，為何要（被迫）學普通話？為何要用普通話？粵語可以「我手寫我口」，為何書面溝通就要用普通話方式？

首先，香港人口以原籍廣東者居多，粵語無疑是社會上一般溝通且頻繁使用的方言，但這與使用和學習普通話不單無抵觸，反而有相得益彰之效。

目前香港粵語的最大問題，在於長期以來文、白（書面語和口語）不分，但又每每「以白兼文」，拿口語當書面語用，並逐漸將之正當化、正常化，以至連教科書內也為粵語方言俗語詞充斥。最近有關教科書中的恰、桌之爭，正好暴露問題的癥結所在。

在香港一些人鼓吹「撐粵語」和以粵語「我手寫我口」之前，包括廣東和香港在內的中國所有方言區的人士，都知道口語和國民共通書面表達方式（文語）的區別，因而各地都能因應不同的場合和需要，進行適當的溝通而無大問題。從未聽聞有方言的存在，受普通話威脅之事。而正常的書面溝通一直以共通的漢語語素為主。縱然隨著時代的前進，書面語出現更多國語／普通話的成分，卻從來不會「以白代文」，以方言「我手寫我口」。

然而，隨著香港經濟起飛，香港文化亦開始日益邁向庸俗化，方言俗語大行其道，且每見充斥新聞報端。社會對文白之分的意識日漸薄弱，以至剛成長的一代竟也全盤接受，連教科書也允許「書恰」之類的

方言詞堂而皇之進入。

「文語」乃是一個民族的成員，不論任何籍貫，都可藉以溝通的書面表達方式。這種書面表達方式，中國過去長時間是文言文，近百年來則是國語／普通話。但不管前者後者，都具有共通的漢語語素，因此不論操何種方言的人士，都能用以溝通自如，而運用這種書面表達方式的優秀，也是國民語文水平的指標。

就恰、桌之爭而論，「桌」乃是漢語表示用以承托物件的有腳傢具的共通詞，但「恰」則是方言詞，只有粵語和部分吳方言使用（更不必說「恰」字的原意是犁柄，用作桌子意思本身便有混淆），這就是文白之分。學校語文課本應該用標準的書面漢語，而不是方言。

遺憾的是，粵語方言詞進入教科書以來，香港學童的中文水平日益下降，現在矯正此弊未嘗沒有亡羊補牢之效，但「撐粵語」卻大有反其道而行之勢，中文教育無疑首當其衝受到衝擊。

普通話成標準語是歷史形成

操粵語人士在進出口語溝通時，根據不同的說者，往往文白夾雜。這種情況本甚平常，只是反映說者的文化素養，這在不少兄弟方言區中也普遍存在。但鼓吹「撐粵語」者卻據此徑謂粵語文白無別，「我手寫我口」自無不可，豈料這正顯露其文化素養不足。伴隨文化素養不足而來的，也往往是庸俗化的表現。方言的庸俗化勢必造成方言所在地區文化的庸俗

化，而當庸俗文化成為社會的主流之時，便是本地方言步向衰落的開始。

鼓吹粵語「我手寫我口」者，在顯示其分離主義意識之餘，亦反映他們缺乏正常的書面表達能力，對共通的書面漢語並無足夠的認識。

普通話是現代中國的標準語，但其形成並非今日始，而是至少有四百餘年的發展歷史。普通話無疑是由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方言發展而成，但這並不影響它作為標準語的地位。

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標準語，都無不由一地的方言發展而來。如標準英語乃來自倫敦及英格蘭東南部的方言，標準西班牙語則以馬德里及其周邊的方言為主。日本的標準語則以東京話為主的關東方言，與大阪京都一帶的關西方言迥異。與普通話一樣，這些國家的標準語的形成都含有其歷史淵源。

一國形成標準語的一大作用，乃便於不同省份或地區操不同方言的國人溝通，同時也便於外國人士與該國國民交流和了解這個國家，換而言之，就是能夠發揮最大的溝通效率。作為中國標準語的普通話當然也不例外，而至今其流通的範圍已遠超中國大陸本土及港澳台地區，遍及東南亞和北美洲。但包括粵語在內的地區方言卻無法扮演這種角色。

普通話作為標準語的另一好處，還在於它便於書面表達和溝通，這也是粵語等地區方言做不到的。現代的普通話本身，實具有不少宋元以來北方白話的成分，而這些北方白話早於逾千年前便開始以文學形式用作書面表達。包括宋代話本小說、戲文、金瓶梅等，元曲以至明清的傳奇及長短篇小說等，大都是這種流行文學的載體，因此普通話的書面表達方式漸為普及。民國前後的政府、語文學者和教育家的推行，以至「五四新文學運動」，只是將國語／普通話的書面（和口語）表達方式，進一步擴大、普及及正規化而已。五四之後國語／普通話逐漸取代文

言，成為唯一能獲全國普遍接受的書面表達和溝通方式。

粵語等地區方言都沒有這些經歷，自然無法成為具有較廣泛和普遍性書面表達和溝通功能的工具。

將粵語推向沒落深淵

歐美語言一般都可利用拉丁字母書寫，故不論標準語（包括口語和書面語）或方言俗語都能以書面表達。然而漢語由於並非拼音文字，粵語等方言除了其中部分漢語共通語詞可用方塊漢字書寫之外，基本上都無法以書面作有效表達，又怎能「我手寫我口」？無疑，過去也曾有一些用方言寫成的著作，其中較突出的包括《二荷花史》等清代廣東粵語彈唱本《木魚書》、上海話小說《何典》、吳語小說《海上花列傳》、蘇州土白話《舊約全書》和溫州小說《福音書》等。但前三者都只屬地區性的通俗文學作品，而後二者則是特為某一地區信眾而設的宣教材料，無不具有極大的地方局限性。而其方言內容每每不是借字寫方音、便是另創方言字表達，因此儘管其行文夾雜文言或普通話前身的官話，也無法取得較廣泛的流傳效果。事實上，這種表達形式，即使在本地區人士，也從來都成了不了平日書面溝通的方式。

標準語和方言各有功能，方言無法取代標準語的功能，也沒有必要取代標準語的功能。英語也有大量的方言俗語，而且如前所述，儘管可以用拉丁字母寫出來，但英國人在正常的書面溝通中都不會用口語（poker）來表示「非常好」，用（yummy）來表示「很美味」或用（red）來表示「英鎊」。這不單顯示社會對標準語的尊重，認識到標準語的功能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性，同時也反映一般英國人普遍具備的文化素養。然而在香港鼓吹所「撐粵語」一者，不單要以方言取代標準語，而且要越俎代庖，要以口語兼文語的功能，惡性循環之下，只會將本地粵語推向沒落的深淵。

當前粵語「我手寫我口」行動在香港社會逐漸漫衍，令粵語的庸俗化日益嚴重，已威脅到中文的正常使用，更威脅到下一代的中文教育。病態的粵語使用情況使粵語質素日漸下降，中文水平每下愈況。社會人士若不再反思，不單粵語在香港的前景堪虞，中文運用也不無大倒退之憂。

香港英籍華人網絡副主席

新中國第五代領導人對祖國統一戰略思考



兩岸互動
李家泉

針政策是明確的」。「我們將保持對台大政方針的連續性，繼續實施行之有效的各項政策，促進兩岸關係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，更好造福兩岸同胞。兩岸同胞要真誠團結合作，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」。2014年5月7日會見宋楚瑜時，強調了對台方針「四個不會」：一是大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「不會改變」；二是促進兩岸交流合作、互利共贏的務實舉措「不會放棄」；三是團結台灣同胞共同奮鬥的真誠熱情「不會減弱」；四是制止「台獨」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「不會動搖」。同時指出，「兩岸關係風風雨雨幾十年，總體趨勢是向前發展的，這是歷史的必然」。

五、強調兩岸應共圓中國夢。2014年2月會見連戰時強調，「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，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」。「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夢，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」。「兩岸同胞要互相扶持，不分黨派，不分階層，不分宗教，不分地域，都參與到民族復興的進程中來，讓我們共同的中國夢早日成真」。2014年9月26日在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又強調，「兩岸要站在振興中華、共圓中國夢的戰略高度看待國家和平統一，進一步加深感情，增進認同，共同反對「台獨」，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」。「特別是要讓更多台灣青年認識到，台灣的命運繫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，從而義無反顧地接下復興中華的重責大任」。

致力促進兩岸繁榮

四、強調對台方針「四個不會」。2013年4月8日會見蕭萬長時指出，「大陸方面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，決心是堅定的，方

擇。只要我們都從「兩岸一家親」的理念出發，將心比心，以誠相待，就沒有什麼心結不能化解，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」。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會參訪團時又指出，「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，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，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。我們理解台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，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，願意用真誠、善意、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」。

二、多次強調「九二共識」。2014年11月9日在會見蕭萬長時強調，「兩岸雙方在堅持『九二共識』、反對「台獨」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建立並持續增進互信，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方向和良好勢頭的關鍵」。2015年5月4日會見朱立倫時強調，「堅持『九二共識』、反對「台獨」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，其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。否認「九二共識」，挑戰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基礎，搞「一邊一國」「一中一台」，就會損害民族、國家、人民的根本利益，動搖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石，就不可能有和平，也不可能發展」。三、強調「兩岸命運共同體」。2013年2月25日在會見連戰時指出，「大陸和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。近代以來，中華民族受到列強欺凌。想起那一段屈辱的歷史，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心痛。實現中華民族偉

作為新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的習近平，與前四代領導人最大的不同點是，他在出任國家領導人之前，就長期工作在與台灣隔海相望的福建省，先後達17年，擔任過廈門市副市長，福州市委書記，福建省省長等職。筆者作為長期研究台灣問題的學者，在他擔任廈門市副市長時，曾去他那裏講學，並曾就台灣問題與之交換過意見。他那時候很年輕，很活躍，對台灣情況也很了解。那個時候，廈門和福建是兩岸經貿合作的前沿區域和大陸對台政策的實驗區，他在那裏積累了不少處理對台事務的經驗，尤其曾為跨海打拚的台商解決了許多難題，在台商留下了良好的口碑。在他任上，廈門設立了大陸首家台商會館——廈門台商會館；福州也建立了第一個以台資企業為主的「工作村」，島內媒體稱習近平為「知台派」。

「一中」戰略具體化

習近平繼承並發揮了新中國前任領導人關於一個中國的戰略思維，並且使之具體化、實踐化和情感化。最突出的有以下幾點：

一、會見台灣政要時多次強調「兩岸一家親」。2014年2月18日，他在會見連戰時強調，「希望兩岸雙方秉持『兩岸一家親』的理念，順勢而為，齊心協力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更多成果，造福兩岸民眾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」。2014年5月7日會見宋楚瑜時指出，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順應歷史潮流作出的共同選

六、強調增進兩岸政治互信。2013年10月6日會見蕭萬長時強調，「增進兩岸政治互信，夯實共同政治基礎，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」。「着眼長遠，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終歸要逐步解決，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」；我們「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，作出合情合理安排」。「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，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可以隨時見面交換意見」。

強調增進政治互信

七、強調加強經濟交流合作。2013年10月6日會見蕭萬長時強調，「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，在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新形勢下，雙方只有加強合作，才能更好應對挑戰」。「要加強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建設，並更加重視促進產業合作」。2014年5月7日在會見宋楚瑜時指出，「我們將深入了解台灣民眾尤其是基層民眾的現實需求，採取積極有效措施，照顧弱勢群體，使更多台灣民眾在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中受益」。2014年11月3日在福建調研又指出，「兩岸同胞同根同根，血脈相連，文化相通，沒有任何理由不攜手發展、融治發展」。「大陸人口多，市場大，產業廣，完全容得下來自台灣的企業」。「希望他們一如既往，繼續為兩岸經濟交流合作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出謀劃策多作貢獻」。

社科院台灣研究所資深研究員